

●张立春 童英华

## 抑制通货膨胀:把握投资重点和扩大就业面

今年上半年,全国总体经济发展形势比较平稳,但物价上涨,尤其是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偏高,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苗子正在显现。可能到来的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同以往通货膨胀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显然这次物价上涨仍是由于投资拉动所引起的成本推动,由于价格的放开使企业可以将成本价格的影响转嫁到消费者,故而对企业的影 响相对说不很严重;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城市的失业、待业人员以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在物价全面上涨,尤其是消费弹性最低的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使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大为降低。因此,这次通货膨胀的最大特点是对社会的稳定将构成较为严重的损害。根据报刊登载的有关资料和官方公布的有关数据表明: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国务院在年初发出了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整的通知,但国务院检查组的调查表明各地争上项目、层层加码、扩大投资规模的情况仍十分突出,若不严加控制,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000亿元的年度计划将被突破。关于零售商品市场,尽管表现为绝大多数消费品仍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但1—4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达20%,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达22%,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油、蔬菜等必需消费品价格涨幅则可能更高。城市中动用储蓄和通过借款维持生活的居民正在逐渐增加。

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和大规模建设中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它需要一定的发展速度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但这种速度应该在合理的限值内,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条件下,使要素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对当前和未来的效益都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容易达到,与合理的速度具有有益于长远的发展一样,有害的高速度也必然产生持续的惯性作用。面对这样一种惯性作用,我们有时还不能采取急刹车的治理方式,因为这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比如今年所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去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失控有着许多直接的原因。去年失控的原因源于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膨胀,与此同时还伴生了房地产、外汇、股票投机,企业乱集资等投机现象,致使国家金融形势十分严峻,对此,中央采取了十分严厉的调控措施,其主要目标是控制资金口子,打击非法投机行为和肃贪。但已上的项目不可能停下,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建项目的停建、缓建和取消都意味着巨额的浪费;另一方面在前十来年里,我国为改善人民生活 and 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以轻纺工业和加工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方式,这带来了对基础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设施的巨大需求,使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也带来了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改善这些“瓶颈”产业需要巨额资金,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长期、高额的投资势必引起对供应的压力,通货膨胀也难以避免。

工业高速发展和超额投入伴生出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农业发展问题。快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对农产品需求的扩大,对农业的投入和保护不足又必然导致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农产

品价格上涨。这几乎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过我国将表现得更为突出：我国可耕地仅占世界7%，人口却占世界22%，而农村人口要占全国人口80%，近年来我国对农业投资比重逐年降低；我国大部分农村市场信息滞后、农业产出率低、产品结构跟不上需求变化，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销售环节薄弱，影响了农产品的供应。在城市，菜篮子工程的不稳定，使城市农副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从而使得城市居民生活费的上升成为最敏感的问题。

我国的国民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尽快接近和超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需要通过两个转换实现：农业化国向工业化国的转换和工业化发展由追求速度的数量型向效益型的转换。这两种转换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带来的严重影响之一便是失业人口的急剧增加。如果说失业人口（包括长期以来就有的隐形失业）的贫困状况在过去平均主义政策下，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尽管穷困心理上尚可平衡而对通货膨胀能有一定的承受力的话，在今天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效，国门打开使人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发展，国内各地、或同一地区不同行业发展的不平衡使人们收入水平、富裕程度差距明显拉开的情况下，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不论在物质上或心理上都降到了最低点。作为失业者当然更难以承受。此外，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企业制度的改革，除了原有的失业、待业人口，企业中仍然存在的隐形失业将逐步“显形”，一些困难企业在破产、兼并过程中也使得大量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以上诸多因素造成了城市低收入阶层的不断扩大。在农村，也出现了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大军，到1993年底已达1亿人口，其中跨省流动的劳动力达8000万。这部分劳动力中的大多数的收入是不稳定且很低的，他们对物价的上涨更难以承受。同时，这部分改变了工作性质的庞大群体的消费方式也在改变，他们由原来在农村自给自足的消费方式转变为在市场购买，他们在流动和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所需的交通、住房、穿衣、食品等对供应都形成巨大压力。当民工潮涌入城市时则给城市的消费资料供应和物价都带来极大的影响。这种状况形成这样一种循环，大量民工一方面是贫困者，他们很难承受通货膨胀对他们的打击；另一方面流动民工的大量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活必需品供应的紧张和物价的上涨。

综上所述，针对这次通货膨胀的特点，我们在治理中不能简单地采取砍基建项目，紧缩信贷方法，而是应根据本次通货膨胀的特点，近期以扩大就业为中心，同时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保投资重点、改善投资结构；对农业生产要坚定不移地实行保护和扶持政策，稳定农业生产，并下大力发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服务业；在城市从扩大就业的角度发展多层次、多方面的第三产业。

1、根据上述治理通货膨胀的思路，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仍将保持一定的规模，关键是把握重点、把握合理的结构。所谓把握重点和合理结构，即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如公路、铁路、码头等交通设施，城市市政设施，原材料、电力、能源及基础工业设施这些瓶颈产业还是要还旧帐。与此同时，投资的重点还应放在具有高技术特征的重加工业方面，因为工业装备的改善，关系到我国具有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化的先导产业的发展，关系到老企业的改造和产品的换代。合理的投资规模和结构，不仅对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而且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

2、大力开拓城市就业门路，解决失业、待业人口的就业安置，提高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在城市工薪阶层，绝大部分家庭中只要有一个人处于失业或待业状态，其生活水平就会大大降低，而一个处于低水平生活状态的家庭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反应是异常敏感的。

解决失业和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除了改善企业经营、减少待业和隐形失业之外，还应发展多层次的第三产业。政府在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和指导中，不仅要将着眼点放在重点扶持的商业、金融、科技、建筑等支柱行业、部门上，还应重视发展劳动密集的各种服务行业。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对各种服务的需求也会多元化。政府若在这方面积极开拓门路和进行引导，对失业、待业人员择业和再就业会起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应在第三产业领域内对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更积极的鼓励政策。因为一来发展私人经济不需国家投资便可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二来私人企业更注重效益，而国有企业往往以数字为目标，因此私人企业更注重市场需求、对市场缺陷更敏感、选择产品更灵活。

3、保护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首先，我国的农业经济一定要走市场农业的道路，但必须是在国家的保护下走市场农业的道路，决不能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可以同大多数工业一样可以采取将其完全推向市场的做法。其次，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量劳动力离开了农村，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农业向农场化发展。在大城市的郊区和周边，农场化更可以先走一步，这一方面可以吸收外来民工使之成为职业化工人以减轻民工潮对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改变城郊农业生产人员的老龄化和妇女化的结构。根据我国办农场的历史教训，农场化不能完全走国营农场的道路，而应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民营化农场。农业生产只有采取农场化的方式，才能实现农业生产人员的职工化、种养加的科学化、农作方式的机械化、品种结构的市场化、供需渠道的信息网络化、农业发展的规划化。农业生产的好坏虽然往往不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但在经济生活中对抑制通货膨胀却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几乎都可证明经济出现震荡时，农业基础的稳固对经济的恢复有着极大的修补作用。最后，发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配套服务业是支持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的重要环节，同时又是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我国农业生产率的较低水平除了自然因素、历史因素等原因之外，对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环节薄弱有很大关系。由于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成本高，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生产者不得益、消费者不得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应该特别注意农业生产的服务体系的建立。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很多，如新西兰的“猕猴桃产业”、上海的“大江鸡”养殖业、我国城市的“菜篮子工程”等等。这方面的经验不仅应该用在一些特色产品上，还应广泛应用到我国的粮、棉、油等基本农作物以及畜牧、养殖业中去。

（上接第17页）通货膨胀程度。因此，治理通货膨胀，要分析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应是严格控制投资规模过大、管理失控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一直很大。1992年投资率高达32.7%，1993年按计划投资是8000亿元，投资率在30%以内，但执行下来，实际完成11829亿元，同比增长50.6%，投资率高达37.7%，而且相当一部分投资盲目地涌向开发区、房地产等预期回报率高的行业。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远高于GDP的增长。如此高的投资需求，投资品价格不会很快下降，最终将影响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当前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措施应该是继续坚持较为紧缩的经济政策，严格控制银根，适当缩小投资规模，遏制过大的投资需求。